

【研究報告】

從馬祖列島灘岸考古調查發現 芻探宋元時期中琉航線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hina-Ryukyu Maritime Route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Surveys on Beaches of the Matsu Islands

趙金勇 Chao, Chin-yungⁱ
陸泰龍 Lu, Tai-lungⁱⁱ
洪婕憶 Hung, Chieh-yiⁱⁱⁱ

■ 摘要

海洋文化地景的概念指涉海上航線與港點所形成之水上及水下文化網絡，並特別重視在海域和陸地交替處的灘岸文化地景。臺灣迄今已發現約莫兩千多處考古遺址，分布全島各地，但灘岸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方才起步。由於海岸地形受全球暖化環境變遷的影響特別敏感，近年灘岸考古研究正方興未艾，而此一研究取徑成果並能反映出近岸可能存在之水下文化資產。

本文彙整灘岸考古調查工作結果和文獻資料，嘗試探討馬祖列島地區古代人文地景的變化以及海上航線的意義，這是以往國內考古調查甚少觸及的新課題。中國古代航海向以山行水勢之重要地景作為指引，而馬祖列島鎮嶽閩江口的關鍵地理位置，明清以降地位益顯重要。本研究調查顯示馬祖諸島灘岸持續出現9、10世紀以來的中國陶瓷遺物，配合文獻以及陸域的考古遺址，說明千年來漢人移居和貿易的活動痕跡。分析顯示遺物數量在分布上於12-14世紀間呈現一個高峰，通過陶瓷器品類的比較分析，可以將閩江口島嶼的考古發現與臺灣北岸和琉球的考古遺址聯結上，應是反映出史料文獻甚少言及的早期中琉貿易航路，研判該海上貿易的性質迥異後世盛行的中日官方貿易。

關鍵詞：灘岸考古調查、馬祖列島、中琉航線、明代海禁

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通訊作者 / cooper@asihp.net）

ⁱⁱ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考古研究員

ⁱⁱⁱ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碩士生

收件日期：2020/1/7；接受日期：2020/5/8

■ Abstract

Our investigation at the Matsu Islands draws perspectives from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networks are intertwined through navigation routes, sea ports, and in particular the littoral zones where marine and terrestrial activities meet. Presently, over two thous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have been recorded covering almost the entire island of Taiwan, but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the coastline is as yet underdeveloped. World-wide, investigations of coastal sites are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s as we face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resulting rising sea levels which will have particular impacts on waterfront sites. Furthermore, this approach can uncover evidence of potential underwater cultural resources at shorelines.

Based on a literature search and our first-hand fieldwork data on Matsu island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s and ancient navigation network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illustrated that ancient seafaring relied heavily on significant maritime landmarks and scenes, explaining how the pivotal location of the Matsu islands at the mouth of Min River could account for their importance to military considerations and maritime trade since the Song Dynasty. Our archaeological surveys of beaches throughout the six main islands shows that substantial deposi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 occurred since the 9th to 10th century AD. Taken together, our data from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materials from terrestrial archaeological sites contribute to a portrait of long-term activities of Han Chinese on the Matsu islands. Our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an abrupt peak of artifacts dated between the 12th and 14th centuries, which merits particular discuss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dentical combination of types of ceramics can link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Fuzho in China and Matsu with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northern shores of Taiwan and Ryukyu, which suggests an early Sino-Japan trade route rarely mention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time. We argue that the nature of this early, unrecorded, maritime trade deviates substantially from the offici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at prevailed in next several centurie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Beaches, Matsu Islands, China-Ryukyu Navigation Route, The Ming Ban

ⁱ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 cooper@asihp.net)

ⁱⁱ Senior Archaeologist, Lungmun Archaeo Consultant Ltd.

ⁱⁱⁱ Master Studen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ceived Date: 2020/1/7; Accepted Date: 2020/5/8

一、前言

臺灣迄今已發現約莫兩千多處考古遺址，分布全島各地，包括高海拔山區的七家灣和曲冰等遺址，低海拔山區在細緻的考古調查下舊社遺址的數量與分部也呈現令人意外的密集現象（林圭偵、鄭玠甫、陳鬱茹，2018）；東海岸呈現了密集的遺址分布（趙金勇，2002），西海岸沖積平原在近年工程開發與法令逐步到位的要求下，譬如南科園區的大規模搶救發掘工作就揭露精彩重要的史前考古堆積、甚至深埋在數公尺土層掩埋之下的文化遺留（臧振華、李匡悌，2013）。高質量的考古調查工作持續產生區域性的遺址資料，對於理解史前臺灣的人文地景和聚落分布模式可說已經逐漸成形，然而灘岸地區的考古資料尚顯不足，考古調查工作也方才起步。Anderson et al. (2017) 提出由於長期海岸地形易暴露於自然環境變遷的影響，逸失減損的考古資訊難以評估。他們的模型估計倘若海水面比現今升高一公尺，在海水上升、洪氾增加與人口遷移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將對美國超過 13,000 處以上的歷史與史前考古遺址造成破壞。各國類似的研究近年方興未艾。另一方面，在臺灣社會由於人為開發、近岸洋流改變等因素，也正大幅度影響灘岸地的人文地景，譬如所謂「下厝坑遺址之謎」正是沙丘堆積受到侵蝕導致考古遺址消逝的案例（趙金勇，2016）。

在上述個案研究的啟發下，不免令人想像其他區域的灘岸考古資料又會是如何的樣貌？更甚者，由「人海」互動所建構出來的灘岸地區海洋人文地景，有多大成分尚未進入臺灣考古學的視野？海洋文化地景（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這個

概念原指涉始於 1970 年代的海上航線與港點形成之水上及水下人群互動網絡；後來廣義地指涉海上航線與港點所形成之水上及水下文化景觀，特別是在海域和陸地交替處的灘岸文化地景（luminal cultural landscape），係人類社會通過各種類型的船舶，利用海洋空間行定居、漁撈、交通與航運等活動，特別是晚期歷史時期隨之產生的海域交通文化的場域（Westerdahl, 2016），包括了航路航線、航標、燈塔、船港、造船廠以及古代船屋、沉船、木樁、地基、壘石牆等，自然也包括澎湖地區著名的文化地景石滬等。

馬祖列島地區人群從事漁撈等航行活動至少有七、八千年的歷史，無疑具備相當豐沛的海洋文化地景研究潛力。明清以來海事記錄召示馬祖海域古來向為國內與國際航道路線上關鍵的山行水勢。在這樣歷史脈絡下，本文就馬祖列島灘岸考古調查的資料，探討當地古代人文地景的變化以及在海上航線的意義。

二、馬祖列島人文地景

「馬祖」作為地理名詞源於今日南竿島西側的馬祖澳。清乾隆二年（1737）《福建通志》的輿圖中已有「媽祖澳」的紀錄（郝玉麟、謝道承，1737 / 1983）。「媽祖澳」源自於此澳後方建有一座媽祖廟（即今日的馬祖天后宮），後來「媽祖」一名逐漸擴大泛指整個南竿島。1894 年刊行的第三版英國海軍 *China Sea Directory* 係根據 1843 年 Richard Collinson 的測繪資料，該海軍地圖至少在 1894 年刊行公布之英國海圖已經出現“Matsou”一字標示，顯示以英文拼音閩南語。¹ 陳壽彭（1901 / 2004）將其翻譯輯書《新譯中國江海險要

¹ 英國海軍地圖 *China Sea Directory* 最早版本 1843 年大不列顛海圖出版之 J. and C. Walker 刻版，係根據同年 Richard Collinson 的測繪資料，後於 1894 年修訂刊行第三版。

圖誌》，推測由於 1842 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條款福州被迫開放，隔年上述英國測繪船泊於南竿島時應是見到著名的「媽祖廟」而拼音註記於海圖上，遂有此之稱。

馬祖列島地形上最重要的特徵是灣澳眾多，早期移民聚落向以依著於澳口的散村形態為主，而此一人文地景特色部分源自東南沿海到當地的地質環境及其長期演育的結果。在地質結構上，馬祖列島與大陸福建省相連，基岩以花崗岩為主，是由兩次不同岩漿事件所形成（李寄嶠、林建偉、葉恩肇、陳正宏、林柏逸，2015）。而在強烈的風化、波浪侵蝕與沖積與再堆積作用過程下，產生當地常見的谷地、崩崖、險礁以及灣澳等地形，而後者又可以分為崖灘、沙灘，以及礫石灘或卵石灘。東西引島上可避風的澳口眾多，但在強浪急湧作用下，幾乎都為崩崖或卵石灘。東引古稱「東湧」，說明附近海域水深四十餘公尺，但急流洶湧的海象特徵。至於沙灘堆積則以細粒石英沙為主，廣闊的沙灘包括北竿的坂里、午沙、塘岐等，南竿馬港（媽祖港），東莒艋澳和滬澳（福正港）等灘岸，在滬澳灘後則可見沙丘發育明顯。著名的塘后道連島沙灘連接北竿塘岐與后澳之間，為一東西走向的沙洲，是國內罕見的海岸地形，早期退潮時露出 4、5 公頃的沙灘，漲潮時為海水淹沒，目前則填土修路而不復見。

馬祖人文聚落地景自早期明清時期以來，向以澳口移民的散村形態為主。移民主要是閩江口附近長樂、連江兩縣人口為主，偶見更南方的泉州人士。澳口地勢內凹，雖然平地非常缺乏，但兩側

峽角可以當作天然的避風屏障，這對於居住於強烈東北季風環境的聚落人群尤其重要。譬如，故老相傳言早年東莒島北端滬裡澳（福田港）由於地形開闊迎北風，缺少擋風屏障，村民於秋冬季節就搬遷到島嶼南端面向西南的大埔居住，形成特殊的季節遷移聚落模式。這種特殊的人文地景正反映出季節風向、地形和聚落選址的重要性。史料也記載在竿塘海域（馬祖列島），秋冬泊船於南面澳口，春夏反之，泊於北側，各島皆然，儼然是一種當地生活的規律法則。

清初康熙二十三年（1684）杜臻撰寫《粵閩巡視紀略》，書中就留下難得的紀錄：

竿塘，兩山相連，在海中，以多茅竿（草），故名。先有居民，洪武（年）間內徙。上竿塘，峰巒層曲，周三十餘里，有竹扈、湖尾等七澳，鏡澳泊南、北風船十餘，竹扈澳泊南風船三十餘，長箕澳泊北風船三十餘。下竿塘，周二十餘里，有白沙、鏡港等七澳，馬鞍澳（今塘岐）泊北風船四十餘，但苦泥滑，下旋易移。（杜臻，1684 / 1983：54）

類似紀錄不一而足，可見當時福建人士對於南北竿的認識特別強調澳口眾多，也知曉何者可避北風居、哪處能泊南風船。

灣澳地形尤其適合通行於東南沿海的「福船」進出，居民生業活動以漁撈為主，故灣澳所夾狹窄的空間就成為居民生活與工作的主要場所，「埠海為塘，劃塘為田」，以澳後斜坡作為村落的腹地。同時，由於馬祖列島地形起伏大，早年陸

上交通不便，久而久之聚落分布形成「一澳一村」的格局。大陸撤退以後，國軍進駐後逐漸開闢興建山海通路，而軍人消費成為經濟的主要來源，應運而生主要的政經中心，環繞在軍務相關商業服務為主的生活軸線，導致傳統聚落形態有所變遷。

類似的人地關係也反映在歷史時期的聚落模式上，已知的遺址地點往往與滬澳存在對應的緊密聯繫。南竿島四大澳，南北兩端最大的介壽港（山隴）與福澳港（福沃、滬澳）雖然開發劇烈，周邊山坡仍可見福沃、介壽和新發現的山隴等遺址，面西正對閩江口的媽祖港，後方先後發現媽港和后沃水庫等幾處遺址。其餘如北竿的坂里、東莒的蔡園裡都是分別面對廣闊的坂里海灘和福正港，東引的燕秀和東莒的熾坪隴兩處歷史遺址雖然海拔略高，實則下方不遠處都有小澳口，新發現的大埔聚落遺址也反映相同的選址原則。

三、馬祖海域在古代航線上的關鍵地位

古代中國人航海向以山行水勢之重要地景作為指引，而非倚賴絕對的空間資訊，馬祖列島與中國大陸一水之隔，鎖閩江口定海灣與羅源灣，居東南海域鎮嶽樞紐的地位。清代曹剛等纂修《連江縣志》就表示福州府外「海潮之來，由南北竿塘大洋湧而匯於進嶼門，²俟定海洋面潮半，下目之水亦至洋面，³仍入於連江福州二港，汐時亦由此出海。」（曹剛、邱景雍，1927 / 1967：

36）也緣於馬祖列島各島嶼在海上地理位置的關鍵，明清海上航線相關的針經圖簿或海防圖不乏提及本地的地名，雖然史料上迭有不同名稱，但最常提到包括南北竿（以竿塘、官塘為主，也有官唐、干塘、關童、關潼、關塘等）、東莒（東沙，也有東犬、東狗、東獅等）、西莒（多稱白犬，偶見白狗、白吠，以及可能誤傳的東沙），以及東引（古稱東湧，也見東永、東澳之名）等名稱。

馬祖列島現存最早出現的史料應是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梁克家編纂之《淳熙三山志》，記述：「崇德里桑嶼、東路、上下於塘在海中、庫本、崇抄作『竿塘』。關嶺、蛤沙、北交舊有鎮，今廢、大小亭山昔黃氏兄弟載寶沒於此，遂二處立廟。」（梁克家，1182 / 1980，卷 12：7）並提及北宋時曾設置官兵駐防於此：「元豐二年十月，閩丘提刑孝直奏添置巡檢一員。初置連江官澳，轉運鈐轄司相度：以迫西洋、閩安，遂置南匿嶼，以兵士七十人為額，管福清縣海道。」（梁克家，1182 / 1980，卷 19：9-10）宋元時期史料對於馬祖的描述相當簡略，但相關論述大體環繞在海防軍事以及航線地景兩個層面，反映出馬祖列島位居兩條重要航線的交會節點。一是中國沿海南北向的國內航線，同時也是古代中國下西洋、南洋的海外貿易主要航線。《鄭和航海圖》⁴公認是 15 世紀前後中國對於亞非海域地理知識最詳盡的圖經（高榮盛，1985），其中兩幅就出現東湧山、

² 即現在南、北竿之間的無人小礁進嶼。

³ 今北竿鄉最北方的高登島，距離對岸大陸的福建黃歧半島僅不及 9 公里，為馬祖地區距離對岸的近距離，到北茭半島也只有 9.2 公里。

⁴ 《鄭和航海圖》原名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係鄭和於 1405-1433 年間 7 次出航之彙整，但目前最明確版本是在近二百年後收入於明代兵學家茅元儀編輯刊行的兵書集成《武備志》末卷（1621 年）。

龜嶼、官塘山及東沙等島嶼的影像，圖幅文字記載該航線向南駛船之針路需「用丁午針二更船取五虎山，用乙辰針平官塘二〔三〕礁外過，用丙巳針取東沙，東沙用丹巳針三更船平牛山。」（鞏珍、向達，1959 / 2000：36）顯見馬祖列島為早前中國下西洋主要航道上必經的山行水勢（圖 1）。

至於另一條重要的航線，則是福建跨海向東北亞的中琉航線，並北上延伸到日本長崎。古代中日海域航線大體分成三大段，北線從渤海經韓國進入日本，中段從揚州寧波直航博多、長崎等九州地區，南線則是這裡討論的所謂「南島」（中琉）航線（周婉窈，2012），出福建港口（明初在泉州，成化年以後改為福州），掠過臺灣北海岸，至琉球群島轉而上行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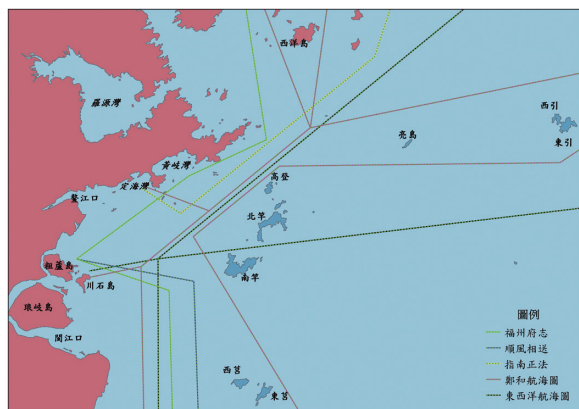


圖 1. 史籍所見閩江口、定海灣以及馬祖列島周邊海域主要航線簡圖，其中三條略呈東西向者即為中琉航線經過馬祖列島的航線

Fig 1. Major maritime routes centered on the mouth of Min River and Matsu islands. The three east-west lines indicate the China-Ryukyu routes

資料來源：根據《福建連江定海灣沉船考古》（趙嘉斌、吳春明，2011）資料重新繪製

達日本，15 世紀已有正式紀錄（曹永和，2000），日本史家則認為中琉官方往來至少始於 1372 年的中山王國初始來華朝貢之事件（高良倉吉，2018）。此後中山王於 386 年期間共朝貢 255 次；山南王與山北王也各自遣送朝貢使者 21 次與 9 次，直至分別為中山王所併為止（分別於 1429 與 1416 年）。明末萬曆年間雖然改為十年一貢，這條中琉航線上往來船隻仍然絡繹不絕，是海外諸國入朝修員最為頻繁的國家（曹永和，1998：310）。值得注意的是，若從琉球的地緣角度觀之，日琉之間的航線時有時無，斷存斷續，相比之下並非常態貿易航線（高良倉吉，2018）。即使明朝亡滅、甚至薩摩藩入侵琉球（1609 年），福州那壩之間始終往來不止，故明清史籍中累積相當的有關中琉航線的海域知識，然而明代以前的跨海活動就只能從考古資料中推論了（木下尚子，2009）。

在這段長期維持密切的封貢關係之際，封舟去程通常由長樂或閩安五虎門出發，經竿塘、白犬、東沙或東湧等島嶼放洋，東南向經臺灣北岸的雞籠頭—花瓶嶼—彭家山（北轉）—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最後經馬齒山進入那霸港。譬如萬曆三十四年（1606）夏子陽到琉球冊封即是循此航線，歷經八日到那霸港，並詳細記載於〈琉球過海圖〉。更早的《順風相送》⁵則記錄非官方的航海知識，書中〈福建往琉球〉言：「北風東湧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彭佳嶼〕，用甲卯及單

⁵ 《順風相送》原抄本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Bodleian）圖書館，抄本序曰：「永樂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鞏珍、向達，1959 / 2000：22），故向達校注時推測最早成書時間有可能是在十五世紀。不過，該書內容曾提到巽它群島東部有「紅毛」居堡，應指最早東來的葡萄牙人，故可以確定至少包括部分 1520 年代的中國人知識。

卯取釣魚嶼〔釣魚臺〕。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臺灣〕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鞏珍、向達，1959／2000：96）無論《順風相送》，或是同冊輯編的《指南正法》，乃至其它如陳侃《使琉球錄》（1534年）、《日本一鑑》和《東西洋考》等書，對於中琉的航線及性質的描述基本是與上述一致的（圖1）。

萬曆末期福建連江士人董應舉曾提議視人用事之關鍵：「水兵伎倆真偽，只看使船。自五虎門抵定海掠海而過，能行走自如，其技十五；掠竿塘、橫山而目不瞬者，技十八。乘風而直抵東湧之外洋望雞籠、淡水島嶼如指諸掌者，惟老漁能之。」⁶（董應舉，1967：26）說明當時連江沿海對於臺灣北海岸清晰的地理知識。近年公布一幅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明代《福建海防圖》（姜勇、孫靖國，2011），其中福州部分由近而遠繪製出當時三個層次的閩海知識，近景為沿海官防配置，中景為近洋島嶼，包括東沙（東莒）、白犬（西莒）、下木（即下目，清晚期改稱高登）、東湧（東引），以及從相對位置可以研判下木島右側的北竿和南竿，遠景則是對岸臺灣的雞籠（基隆）、淡水、新港等重要港口。陳宗仁（2016）綜合奏疏檢查圖中標示兵寨游移的地點及時間，研判該圖應繪於1616年前後。可以見得，就17世紀初福州海人的知識而言，無疑是涵蓋了馬祖通往北臺灣的交通（陳宗仁，2005），吾人也可以合理推測兩地之間的民間海上交通確實存在，至少「老漁能之」。杜臻撰《粵閩巡視紀略》（1684），言到：「（竿

塘）二島……凡哨探淡水、雞籠、琉球、日本，俱從此放洋、認此收澳。」（杜臻，1684／1983：54）可見明清之際從福州經馬祖出洋，溝通臺灣北部與琉球日本的海道航線是可以確認的（何孟興，2009）。

即使明初實施海禁之際，中琉航線仍在琉球對明朝朝貢的基礎上持續扮演重要地位，並且曾經規定琉球朝貢船必須自福建港口登陸。考古資料顯示該航線至少元代已經存在（木下尚子，2009；龜井明德，1995），至於是否可能早到10世紀或11世紀前後（森達也，2019），則是本文主要嘗試探討的問題。以下就馬祖濱灘考古調查的發現，通過分析陶瓷器年代與品類組合模式，探討中琉航線在宋元時期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貿易活動的性質。Liu & Wang (2017) 近年整理臺灣本島發現的10–16世紀中國貿易陶瓷器，就考古證據對過去的海上貿易航線進行探索。他們提出宋元時代華商南海貿易的「小東洋」航線，出福建港口，經澎湖「掠過」南臺灣而進入菲律賓，可能因此切斷了原本長期存在著聯繫臺灣與環南海地區的海上網絡。若然，筆者懷疑或許約莫同時還存在另一條「北線」航路（從臺灣的角度來說），從閩江口出馬祖列島入洋，同樣「掠過」臺灣的北海岸，然後沿著先島群島北向連接琉球群島。

四、灘岸考古發現的意義與性質

如前所述，灘岸考古調查在臺灣尚且方才起步，實際執行上也與一般的陸域考古遺址調查有所差異。在馬祖列島的地

⁶ 董應舉〈與韓海道議選水將海操〉收錄於《崇相集選錄》，本文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董應舉萬曆四十年上〈嚴海禁疏〉以告歸在籍，所著《崇相集選錄》應是1610年代相關詩文紀錄。

形條件下，澳口灘岸基本上都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各澳面寬有大有小，差異頗大，如南竿媽祖港沙灘面寬約 200 公尺，澳口縱深近 500 公尺，範圍之大為列島各澳之首。北竿島坂里沙灘面寬超過 400 公尺，是最為廣袤橫互的沙灘，至於其他一般澳口灘岸面寬多在約 100 公尺上下。而灘岸調查最顯著的特性，則是調查的時間會受到潮汐起伏的嚴格限制，必須掌握最適當的時機。馬祖列島海域受閩江口水文影響，潮差較大，往往在 4、5 公尺以上，南竿福澳港日平均潮差約 4.24 公尺，大潮平均潮差為 5.46 公尺，東莒福正港最高可達 7.3 公尺。因此，灘岸考古調查首要配合潮水漲落，往往必須在破曉微光或於昏暗暮色之中加緊調查，方能掌握低潮海水退去的短暫時間，對於調查的強度自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而無法進行灘岸調查時則安排在澳口周邊坡地或陸域遺址調查，以瞭解海域陸域二者間發現遺物的關連性。

灘岸調查的考古發現多少可謂非典

型的考古資料，有必要先評估調查工作的質量與內含，思考影響「形成過程」的自然和人文因子，方能進一步推敲調查資料所反映古代行為的意義與性質。本文的資料涵蓋 2017–2019 年間前後數次的田野調查，分別調查了南竿島 13 處、北竿島 8 處、東莒 7 處、西莒 6 處、東引島以及西引島各 3 處等總計 40 處灘岸（圖 2–5），其中至少在 20 處發現灘岸實質的歷史時期陶瓷器遺物（表 1），約占半數，灘岸與陸域採集超過一千餘件標本。但是，各地澳口的發現數量差異非常顯著，最常見的情況是稀疏散布零星遺物（表 1 所列數量等級屬於 1–2 級），且多為 19 世紀，甚至 20 世紀的晚近遺留。然而，包括南竿媽祖港、北竿芹壁鏡澳以及東莒滬澳福正港等灘岸，則可以發現密集而大量的陶瓷遺物，顯示灘岸考古遺留並非均質現象，其背後存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變遷與歷史發展脈絡。

首先，發現大量陶瓷遺物的灘岸地點往往可以連結到鄰近的早期漢人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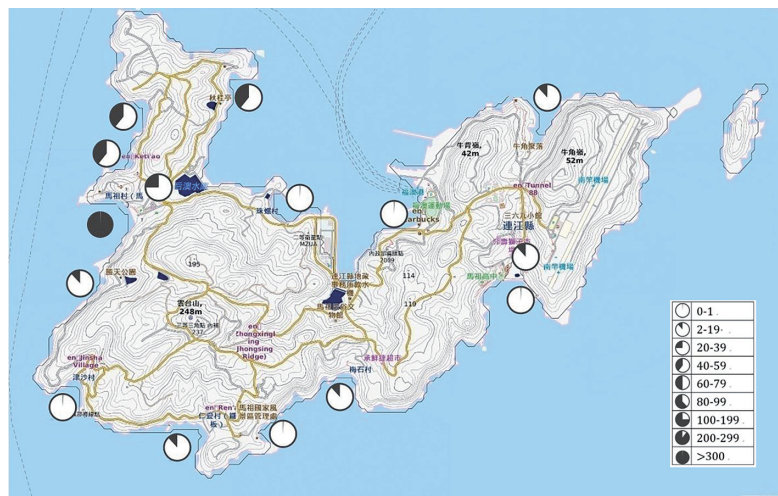


圖 2. 南竿島調查地點與採集標本數量分布

Fig 2. Locations and graded pie-charts of collected ceramics found on the Nangan Island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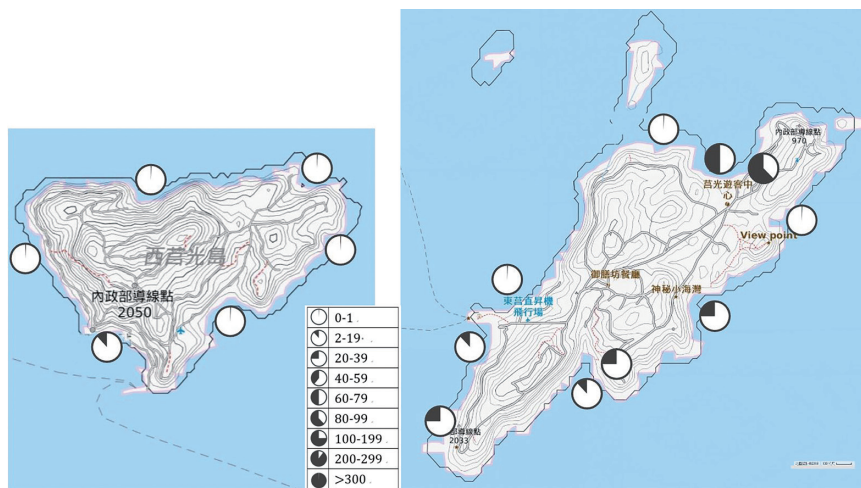


圖 5. 東莒島與西莒島調查地點與採集標本數量分布

Fig 5. Locations and graded pie-charts of collected ceramics found on the Dongju and Xiju Islands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1. 歷次馬祖列島考古調查地點及發現遺物數量分級概述

Tab 1. Brief descriptions and grades of locations and sites found in Matsu islands

島嶼	調查地點／遺址	地點位置與調查成果簡述	數量等級
南竿	后沃水庫遺址	新發現，卡蹕英雄館後方山稜與緩坡	2
	山隴遺址	新發現，介壽村東北山坡	1
	津沙 I 遺址	新發現，津沙聚落西南山坡	1
	津沙 II 遺址	新發現，津沙聚落北側山坡	1
	鐵板遺址	新發現，仁愛村金坂境天后宮後山	1
	馬祖港	新發現，媽祖港天后宮前方沙灘	8
	夫人澳	夫人咖啡館下方卵石灘	3
	芙蓉澳	新發現，馬祖生態教育館（藍眼淚生態館）前方沙礫灘，已築海堤	3
	科（曲）蹄沃	新發現，四維村白馬文武大王廟下方沙礫灘	3
	勝天沙灘	新發現，勝天公園下方小澳口卵石灘	1
	牛角澳	新發現，牛角村前方沙灘，已築海堤	1
	介壽港	無發現，介壽村外側，已築堤填土	0
	福澳港	無發現，已築堤填土闢建港口碼頭，唯後方坡地曾見少量遺物	0
	津沙沙灘	無發現，津沙聚落前沙灘，已築海堤	0
	深水 / 美瑞澳	無發現，神農山莊下方沙灘	0
	大澳	無發現，北海大漢坑道外卵石灘	0
	金坂澳	無發現，仁愛村鐵板村外卵石灘，已築海堤	0
	珠螺澳	無發現，沙礫灘，已築海堤	0

表 1. 歷次馬祖列島考古調查地點及發現遺物數量分級概述 (續)

Tab 1. Brief descriptions and grades of locations and sites found in Matsu islands (continued)

島嶼	調查地點／遺址	地點位置與調查成果簡述	數量等級
北竿	坂里 II 遺址	新發現，坂里東北側農田	3
	坂里 I 遺址	民宅 58、60 號後面	2
	坂里 III 遺址	新發現，坂里南側沙丘，天后宮旁新闢旱田	2
	芹壁（鏡澳）	新發現，芹壁聚落下方沙礫灘，築海堤	6
	橋仔澳	新發現，橋仔港卵礫灘，已築海堤	4
	塹澳／中澳	新發現，坂里村白馬尊王廟下方沙礫灘，築海堤	2
	塘岐澳	新發現，機場北側塘岐沙灘，築堤填海	2
	午沙	新發現，午沙村下沙灘，已築海堤	2
	八使（后）澳	新發現，機場對面后沃村沙灘，新築海堤內沙地	1
	坂里沙灘	無發現，坂里村前廣裘沙灘，築海堤	0
	白沙澳	無發現，現白沙港，已築堤填海闢建碼頭	0
東莒	蔡園裡遺址	福正港後方沙丘	4
	大浦遺址	新發現，大浦聚落旁旱田	1
	熾坪隴遺址	大坪村聚落的西南角海階平臺緩坡	1
	滬澳	新發現，現福正港沙礫灘	4
	大浦石刻下灘	石刻遺跡所在之斜坡及下方礫灘	2
	神秘小海灘	新發現，神秘小海灘，大量近代遺留物	2
	鯪澳	新發現，現今猛澳港，已築堤填海闢建碼頭，但仍保留部分原始沙灘	1
	鯪澳北灘	新發現，現今猛澳港隔堤北側的沙礫灘	1
	大浦澳	新發現，大浦聚落下方峽灣澳口，岩灘	1
	連島礫灘	無發現，通往與犀牛嶼相連礫灘	0
	西莒	小澳	新發現，青帆港（青蕃澳）北方、中正門西北側沙灘，已築海堤
菜埔沃		無發現，卵礫灘，已築海堤	0
坤坵澳		無發現，沙礫灘	0
樂道沃		無發現，樂道澳水庫下方的卵礫灘	0
無名澳		無發現，田沃北側無名卵礫灘	0
田沃		無發現，新築海堤，近年受海水侵蝕嚴重	0
東引		鑼鉞角遺址	新發現，從泰山府景觀步道南端向下延伸到鑼鉞角公園，見貝塚、陶瓷器等
	燕秀遺址	無發現，目前為雜林覆蓋	0
	南澳	無發現，已填海築堤闢為今日中柱港港區	0
	北澳	無發現，卵礫灘，顯能抵達	0
	發電廠外澳	無發現，卵礫灘	0
西引	清水澳	無發現，卵礫灘	0
	外澳	無發現，卵礫灘	0
	西北澳口	無發現，卵礫灘，顯能抵達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註：灰底表示陸地考古遺址，遺址位置和數量等級參照圖 2-5。

毫無所獲，而為了確認此一情況，三度於落潮時分仔細調查坂里沙灘，結果仍然一無所獲。當時曾經懷疑或許受到觀光開發（前方為遊客服務中心），或颱風侵襲等自然因素影響，然地方人士均稱近年並無大型工程，且殘留佇立的軌條砦，也顯示坂里沙灘的地景改變有限。後來通過口訪耆老才瞭解到，坂里灘岸看似平穩如鏡但其實岸外水面下卻存在強勁紊亂的湧流，對於早年通行於此海域的尖底福船來說相當危險。所以，故老相傳早年無論商貨與漁船都另泊於北側的午沙澳，再徒步馱物往來。午沙澳是規模中小型的砂岸澳口，灘岸上也發現的不少陶瓷器遺留，包括多件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前期北宋後期的閩清窯白瓷玉緣（唇口）碗，說明漢人於此活動的歷史悠久，也大體吻合族譜推測的移民時代。

其次，我們也考量到調查成果數量多寡或許和港澳的大小有關，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馬祖港與福正港。然而，此一相關性也非必然，譬如東莒艋澳與前述北竿坂里沙灘，雖則面寬廣袤但調查所獲非常有限。另外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則是自然環境的差異，尤其是灘地的性質，倘若當地屬於礫灘或半礫灘，基本上很難發現遺物。以東西引島為例，西引的清水澳的景觀大體保持原始風貌，在歷史和當地口傳中這裡向為重要的泊地，然而，調查在滿是卵礫的澳口內卻是遍尋不得任何遺留。推想一來湧流強烈，二則潮差劇烈，造成澳內海水的能量太強，導致相對軟質的遺物都無法保留下來。

最後，馬祖列島各地港澳地景在近年受到嚴重的人為改變，福澳港、白沙港、青帆港等天然良澳，一一填海築港關建

碼頭，而塘岐澳則因拓建機場，早年灘岸已大幅度減縮。即便仍然保存自然地形的小型澳口，如金坂、津沙等，也往往築起高聳的防颱海堤工事，地景否變，灘岸上覆蓋著厚厚的沙層整體墊高起來。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受到海水侵蝕，譬如西莒島東側田沃澳由於近岸流改變，整個村前的緩坡幾乎侵蝕殆盡，老房舍懸立於新築海堤旁，自然難以尋獲任何早期的遺物。這些自然、人為因素深刻影響灘岸調查資料的完整性，必須通體考量。

五、陶瓷遺留分期分析

此文分析排除發現數量過少（3 件）的地點（以避免偶然性誤差），共分析馬祖列島 14 處灘岸與 6 處陸域歷史時期遺址採集之標本 1,066 件，扣除不明或無法辨認的標本 94 件，餘者年代可以區分成六段八期如表 2 所示。

（一）第一段：9-10 世紀晚唐到五代期間

1. 溫州窯「越窯系」青瓷

分別於媽祖港、滬澳福正港與蔡園裡遺址採集至少 8 件可能是溫州窯的越窯系青瓷（圖 6），僅存圈足連接腹片部位，應都屬於碗。標本作白灰胎，質地較純，但燒結程度略低，仍似硬陶器。內器面亦近乎滿釉，施罩青綠釉，僅在內底心周緣留下疊燒泥痕，細條泥痕旁側一圈弦紋（除一件外），外器施釉不及圈足，外底心無釉。弧腹身，置圈足，圈足寬，足尖厚著地處削平，部分留有與泥條支釘有關的附加堆泥。一件平底碗，著地處外部堆附泥條，內滿釉，外器釉不及底，內外疊燒泥痕清晰。同類型製品研判應為

表 2. 遺留分段分期
Tab 2. Chronological phases and numbers of collected ceramics

分期	時間段								年代不明	小計
	I 一期	II 二期	III 三期	IV 四期	V 五期	VI 六期	VII 七期	VIII 八期		
9-10 世紀/ 晚唐 - 五代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上半 /北宋中— 南宋早	12 世紀末至 13 世紀早/ 南宋中	13 世紀後至 14 世紀末/ 末 - 元早	13 世紀後至 14 世紀早/ 元 - 明初	15 世紀末至 17 世紀前半 /明中—明末	18-19 世紀 /清代中後	20 世紀 /民國			
採集地點										
馬祖港	3	69	59	52	37	11	42	14	44	331
芙蓉澳	3	1	1	1	1	1	51	1	1	57
科蹄沃			1	1	1	1	45	1		49
夫人澳		1					49	2		52
塘岐澳			1		1		22		3	26
午沙	7	1					19			27
橋仔澳		2	2	2	5		31	1	4	45
中澳 (滕澳)		1	1		5		25			31
芹壁	1	6	4	4	24	1	81	1		118
福正港	7	3	3	5	5		29	1	7	60
大埔石刻			1	1	1		18			20
神秘小海灘								22		22
艋澳							16			16
小澳 (青帆港)							6			6
山隴	3	7	7	3	3			1		17
后沃水庫	7	1	1	1	2		7	4		22
蔡園裡	3	24	7	2	6	1	9	30		82
坂里 I	1	9	9	1	8		5			33
坂里 II				1	1		37	1		39
大浦			1	1	4		8			13
小計	14	126	98	73	104	14	500	43	94	1066
百分比 (%)	1.4	13.0	10.1	7.5	10.7	1.4	51.4	4.4	不計	1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註：灰底表示陸地考古遺址。

溫州窯的「越窯系」青瓷，年代約在晚唐五代的 10 世紀左右（森達也，2015）。

2. 懷安窯青瓷

粗品青瓷碗與可能是罐的底部至少六件（圖 7），分別採於媽祖港與滬澳福正港。胚體白灰到灰，瓷化程度低，見雜質。內部及外部上半為施罩青黃釉，其中一件平底直壁鉢則僅於口唇內外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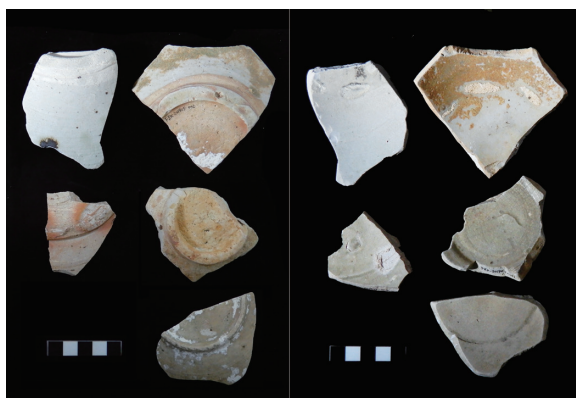


圖 6. 10 世紀溫州窯的越窯系青瓷
Fig 6. Yue celadon wares from the Wenzhou kilns dated around 10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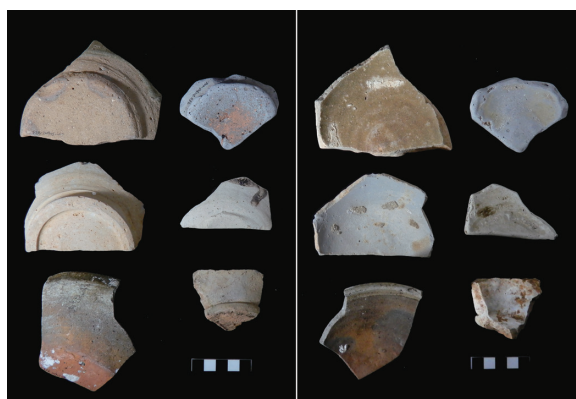


圖 7. 10 世紀懷安窯生產越窯系青瓷
Fig 7. Yue celadon wares from the Huaian kilns dated around 10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半部施釉，罐器內底也無釉，內底心周緣以及足底留下長條疊燒泥痕。多為餅形的實足，圓餅內凹（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96，圖四十四、四十七），僅一件置矮圈足，外撇。懷安窯為福州市附近最早的瓷窯之一，窯口發掘資料顯示長條泥點支釘（托珠）疊燒技術的出現始於唐代（同上引）。同類型遺物也曾於東莒蔡園裡遺址考古發掘出土（陳仲玉、游桂香，2010），年代研判在 10 世紀前後。

(二) 第二段：11 世紀末至 13 世紀早期，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

1. 閩江「閩清窯」⁷ 白瓷

這一組白瓷器物包括二群共同出土的品類：高圈足撇口碗以及唇口（玉緣）碗（圖 8）。見於南竿媽祖港、芙蓉澳與后沃水庫遺址，北竿午沙、芹壁、坂里 I



圖 8.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前期北宋後期的閩清窯唇口（玉緣）白瓷碗
Fig 8. White-ware bowl sherds with thick rim from the Minchin kilns, Fujian, dated to the late 11th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12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⁷ 根據森達也（2019）教授意見，閩清地區除了義窯之外還有許多窯，並且宋明之間都生產相似的陶瓷器，倘若僅用「閩清義窯」並無法涵蓋所有的窯口，故以「閩清窯」稱呼。特別是灘岸採集標本滾磨嚴重，往往難以區辨質地的細微差異，故本文從此意採用「閩清窯」一名。

遺址，以及東莒滬澳福正港和蔡園裡遺址等多處，至少有百餘件，是發現相當普遍的一組器物，相當典型。基於兩個品類的共伴變化，可以更細緻的區分出早晚兩個時期，早期為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前半期的「典型」高圈足撇口碗和唇口碗，晚期從 12 世紀後半期至 13 世紀初，撇口碗的圈足較矮，而唇口碗的唇口則變得更加寬厚。相同的組合與變化見於南宋市舶務原址上海青龍鎮遺址地層（王輝，2015），出土了大量的福建白瓷（主要為閩清窯製品），南宋太廟遺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2007）和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2008），以及元代慶元府倉庫的寧波永豐庫遺址（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或在朝鮮半島西側的秦安馬島水下遺址出水中國陶瓷也能看到相同的組合（國立海洋文化財研究所，2013）。不過，考量到灘岸採集品滾磨破碎情形嚴重，部分細微特徵難以區辨，故本研究保守地將它們框在一個時間段之內。

2. 福清東張窯黑釉茶碗

採於山隴和坂里遺址第一地點，可能也存在於馬祖港灘岸採集遺物之中，至少有 10 件。胎壁薄，胎體為灰黑色，胎質較粗，多氣孔和沙眼。外器施釉不及底，施釉線也不齊整，並且有聚釉的情況，釉色醬黑。器型可辨認的屬於束口茶碗，口沿內束，唇部微微外撇或直，內口緣下有一道淺淺的凹槽。栗建安（2011：435-436）認為原稱為「石坑窯」的福清東張窯黑釉茶碗，根據共伴出土的篔紋劃花青瓷碗研判，年代大約是北宋晚期—南宋（12 世紀晚期至 13 世紀中後期）。

3. 福建青瓷

普遍出現在南竿媽祖港、芙蓉澳與山隴遺址、北竿芹壁與坂里 I 遺址等多處，這一品類的約五十餘件，定年在 12 世紀後半期至 13 世紀前半。南宋福建青瓷的特徵是以篔劃紋或櫛剉紋仿龍泉劃花青瓷，釉色黃青（圖 9），與主要年代在 12 世紀前半或更早的閩清窯青瓷接近青白的釉色有所區隔。不過後者主要年代在十二世紀前半或更早。器型以碗和盤為主，圈足小而低，挖足，足尖平。一般相信福建青瓷在複數窯址生產，譬如莆田庄邊窯就是代表性生產窯口之一，篔劃紋比同安窯更細緻。



圖 9. 12 世紀後半至 13 世紀上半福建篔劃紋青瓷
Fig 9. Celadons wares with coarse comb pattern incisions from Fujian dated to betwee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2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4. 其他

包括有一件馬祖港採集北宋景德鎮青白瓷以及少數磁灶窯的黃釉鐵繪盆。後者灰胎含雜質，薄壁微曲，應是靠近盆心的部位，於白色化妝土上以鐵繪牡丹花紋。同類型紋飾器物曾出於日本博多地區，始於 11 世紀後半，盛於 12 世紀，到了 13 世紀數量逐漸減少（田中克子，2011）。

(三) 第三段：13 世紀後半–14 世紀後，南宋末到明初

1. 連江浦口「今歸仁」類型白瓷碗（圖 10）

普遍在八處以上地點採集得近 40



圖 10. 13 世紀後半至 14 世紀後閩江浦口窯為主的「今歸仁」類型白瓷扁碗

Fig 10. Nakijin white-ware bowl shards from the Pukou kilns on the Min River, dated betwee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 and the late 14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件。此類在日本稱為今歸仁類型的白瓷淺碗，一般相信多數在連江浦口窯生產（木下尚子，2009）。特徵是器身矮，碗身直上外侈，圈足相對非常矮而寬，略外侈，足尖刮平，足內緣根部挖成內凹，足心基本平的。碗心帶澀圈，或無釉，偶見滿釉或內有印紋或外器表有篋劃紋或粗蓮瓣紋。年代在 13 世紀末–14 世紀前半。

2. 閩清窯“Birosuku”類型白瓷碗（圖 11）

在六處不同的地點採集近 30 件，在日本稱為「ビロースク」（Birosuku，以沖繩石垣島一處遺址為名）類型的白瓷碗，一般相信產自閩清一帶，特別是以義窯為主（木下尚子，2009；栗建安，2010）。薄釉，內滿釉，器外施釉抵圈足外緣上方，器表輪製拉坯的稜線痕跡明顯。一般胚體白，器身較厚，碗壁弧轉，足尖寬而切平，足心挖足明顯。內碗心常見印紋或劃紋，外器面無紋。年代也在 13 世紀末至 14 世紀前半。



圖 11. 13 世紀後半至 14 世紀後福建閩清窯“Birosuku”類型白瓷碗

Fig 11. Birosuku white-ware bowl shards from the Minchin kilns, Fujian, dated betwee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 and the late 14t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3. 其他

包括磁灶窯宋元時期陶罐殘件，福建蓮瓣紋與篋劃紋青瓷，約莫同時期的龍泉青瓷碗，稍晚的元代龍泉，以及可能是福建閩江中下游生產的的罐、蓋、壺等器與其他特徵難以決定的青瓷與白瓷殘件，數量超過 60 件。

(四) 第四段：15 世紀末至 17 世紀前半，明代中後期

整體數量銳減，僅採得 14 件標本，包括明代龍泉執壺（1 件）、磁灶窯四繫罐（6 件），以及少量屬於這個時間段的青花瓷片，至少包括 4 件 15–16 世紀初／中期的景德鎮青花，以及 16 世紀後早期漳州窯排點紋青花碗和 17 世紀早期典型漳州窯靈芝花草紋青花碗各一件（圖 12）。

(五) 第五段：18、19 世紀，清代中後期

數量最多，採集標本超過 500 件，



圖 12. 明代漳州窯青花：16 世紀後期排點紋青花碗（上）和 17 世紀早期靈芝花草紋青花碗（下）

Fig 12. Zangzhou Ware blue-and-white bowl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arallel dots pattern of the late 16th century (below) and fungus-scroll design of early 17th century (above)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幾乎在所有灘岸或多或少都可發現，也出現在村落內外、花圃、公園與旱田等隨機調查的地點。主要是華南生產的簡筆青花與印青花之碗和盤，其他有少量香爐與盒子，以及德化窯的釉上五彩瓷器（3 件）。說明到了清代中後期，馬祖列島聚落分布的格局基本上已經與現代頗為相似了。

(六) 第六段：20 世紀，民國時期

這個階段各處灘岸普遍會出現為數不多的戰後臺灣陶瓷製品，多為厚胎中型碗以及鶯歌燒製的褐釉甕（釀酒使用），反而在臺灣隨處可見的日治時期日本瓷器在馬祖列島相對罕見，應該反映出戰地政務階段以來的社會與政治發展。

六、討論

陶瓷器遺物分期由於不同標的品類的流行時間時段差異，據此建立的分期架構中各期的持續時段也往往不同，譬如第五段涵蓋了 200 年，第六段僅不及 50 年，也由於各個期段跨距年代的基數不同，很難直接比較遺物數量的意義。以下將採集遺物的分期統計數量，轉換成為以「每世紀」的「陶瓷器遺物總數」為計數單位，並以每百年世紀當作橫座標（圖 13）。通過上述轉換，可以發現馬祖列島整體上陶瓷器的出現與密度呈現兩段高峰，而非連續穩定成長的模式，並且不同時代採集遺物數量高低的差異至為顯著，研判應不是隨機或因為調查人為誤差所致。整體而言，9–10 世紀開始可以發現漢人逐漸進入馬祖列島活動，最早出現在馬祖港、福正港以及陸域的東莒蔡園裡遺址等，然後稍晚 11 世紀的午沙和芙蓉澳，以及陸域考古遺址包括北竿坂里以及南竿的后沃水庫與山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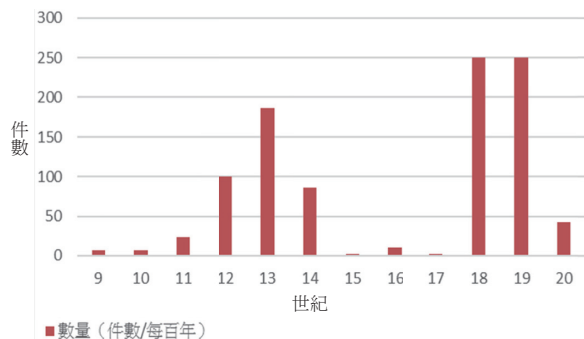


圖 13. 經轉換陶瓷器遺物數量分布 (以「每世紀」的「陶瓷器總數」為統計單位)

Fig 13. Normalized numbers of collected ceramics for each century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地點，都可以看到早期的漢人拓殖移居，並分布在各主要島嶼。遺物逐漸增加，在 12–14 世紀之間達到第一段高峰。第二個高峰出現在清朝中後期（18、19 世紀），代表性遺物青花瓷器遍布各地，無論是陸域或灘岸幾乎無處不在，反映漢人移民聚落的基本格局已然確立，並一直持續到戰後國軍進駐時期，人文地景基本一致。本文的焦點在於討論第一段高峰，也就是 12–14 世紀之間，遺物和發現點數量都遠高於後來的 15–17 世紀。我們認為它與福州經過馬祖、北臺灣到琉球之間跨海貿易的開發，應存有密切的關連。

首先，15–17 世紀遺物數量的低谷階段無疑是反映了漢人開發馬祖列島的政治歷史，特別是明末到清初反覆的「洗島靖海」政策。明初以降，馬祖諸島上開始大量出現於奏疏、方志等文獻之中，反映特意加強攸關福州外海邊防安危的竿塘山，而海禁政策就是禦寇的一環。即使終明一朝的海禁政策就是在嚴弛之間不斷輪轉變化的，但「墟地徙民」措施強制島民移居內陸（間接說明當時已有相當的定居人口），以達到「島民進內陸、寨軍出近海」。特別是明末的嚴格執行全面而

且徹底，連遠居海外的澎湖亦不能免於外（何孟興，2015）。雖然隆慶元年（1567）宣布解除海禁，不過福建巡撫仍於隆慶二十八年（1594）上奏朝廷建議「募民墾海堰地八萬三千有奇」，顯示在長期海禁的摧殘下沿海島嶼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生息。但是 1661 年清廷又再發布遷界令，以斷絕物資接濟明鄭家族勢力，導致馬祖列島等沿海島嶼再次荒廢。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平定臺灣，次年開放海禁，准許民間商漁船出海，但是海外的島嶼仍未解禁，竿塘諸島仍為禁山。直到 18 世紀後清政府鼓勵移居島嶼，連江、長樂等縣沿海居民移入馬祖列島，各地澳口才發展成漁舟泊憩之所，這發展歷程也就反映在上述第二段灘岸遺物的高峰。而反覆數個世紀的海靖禦寇政策所導致馬祖列島一片頹圯的人文地景，同樣也反映在 15–17 世紀間當地考古資料幾乎闕如的情況。

從上面結合史料的討論顯示，考古調查遺物數量的分布模式可以與文獻呼應，反映出歷史進程的發展與波動。若然，我們該如何解釋 12–14 世紀這一段遺物高峰階段的意義呢？一方面它固然反映出史料所見北宋中期以來漢人的拓殖開發，考古資料顯示至少在八處灘岸與四處遺址出現北宋時期的遺物。深入探究物質遺留的內容與品類組合，我們進一步認為與福州—臺灣北岸—琉球航線的海上活動可能有關，其性質應該並非官方或大型海船的貿易，而可能偏向民間小規模的跨海交易活動，在臺灣本島的北部海岸，至少於北宋中後期開始華南出口陶瓷器已經出現在大埕坑等考古遺址（王淑津、劉益昌，2010）。

日人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記錄了唐代福建與日本之間已有商貿宗教往來，譬如泉州僧人曇靜於天寶十三年（754），隨唐高僧鑒真搭乘歸國的遣唐使船隻同赴日本。成書於840年的《日本后紀》曾記錄到遣唐使從長崎平戶島出航後遭風漂流到馬祖北側的福州長溪縣（今霞浦），幸賴隨行的空海和尚為文解釋使團的遭遇，這個紀錄說明了當時的福州地區對於日人的出現尚且並不熟悉（藤原冬嗣、藤原緒嗣，840）。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在福州設置榷貨務，發展南海商貿，但也有少數往來日本。胡滄澤（1999）認為北宋當時可能已有福建與日本之間的穩定航線，反映在福州太守蔡襄《荔枝譜》：「福州種殖最多……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醜之」（蔡襄，1059／1991：8）。木宮泰彥（1980）根據中日有關史料推估北宋時期福建海商通日本的次數至少有九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泉州商客李充曾兩次到日本從事貿易。成書12世紀中葉的日本文獻《朝野群載》的內容顯示，他航赴大宰府之前先至明州申辦公憑請求正式貿易，但該次行程的主要目的卻是附帶回收前次因缺少正式公憑而遭留置的貨款，說明私貿易顯然是存在的（黑板勝美，1964／2007）。不過，是以往研究論及南宋到元代的福建海外貿易，通常聚焦在泉州，而往往忽略了福州扮演的積極角色。同樣地，在討論東北亞通日本和高麗的海貿路線，也都強調以貿易據點寧波（明州）為起點，福州則甚少提及（森達也，2019：107）。然則，通過考古出土遺物的比對，這條中日跨洋貿易的「南線」，似乎在宋代已經浮現。

元代中期以前，閩江流域（特別是閩清一帶）所生產的Birosuku類型白瓷碗和今歸仁類型青瓷，開始大量出現於琉球群島13世紀後半期至14世紀前半期的考古遺址，然而，由於這兩類陶瓷在北方的九州幾乎完全不見出土，但在馬祖與北臺灣都有相當數量的發現，故應該是經由福建—臺灣北部—先島群島的這一條路徑貿易到琉球群島，而非通過日本再向南流通（木下尚子，2009；龜井明德，1995）。而時間來到更早階段11世紀末至12世紀，臺灣北部、琉球群島與九州等地的考古遺址都出土類似的中國陶瓷器品類，包括白瓷唇口碗和印花紋盤等福建閩清窯白瓷或福建仿龍泉窯青瓷、龍泉窯青瓷與景德鎮窯青白瓷等，因此同樣存在通過臺灣北部流通到先島的可能性（王淑津、劉益昌，2010）。或許，這與福州作為國內流通的據點，再轉送至臺灣與琉球有關。歷史文獻上宋代市舶司始終並未把臺灣視為特定之海外貿易對象，甚至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印象。這意味著，臺灣北部出土中國陶瓷的來源性質，或許可以視為以福州作為起點的中國國內網絡之延伸（森達也，2019：102）。

若然，由於馬祖列島在福建近海航線上的關鍵地位，推想應該也曾參與其中，並可能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不過，這種交易在本質上與透過市舶司的正式海外貿易迥然不同，其性質應是以臺灣先住民為對象的小規模交換或私貿易。由於臺灣東北部在地理上和與那國島鄰近相通，可能通過臺灣島內的轉點交換（down-the-line exchange）體系，將這些閩江流域生產的白瓷唇口碗和撇口高圈足碗，輾轉交易進入另一個更廣泛的琉球群島貿易圈，進而聯繫上日本九州地區。這樣交換與交

易體系的存在，有助於解釋近年在臺灣零星散見的 10–14 世紀中國陶瓷器，譬如八里的下罟坑遺址、東北海岸漢本遺址以及西南平原彰化一帶發現的越窯青瓷 (Liu & Wang, 2017)。

馬祖列島發現的 12–14 世紀中國陶瓷器，數量堪成一個高峰，內容的主要品類包括 11 世紀後半至 12 世紀前半的閩清窯白瓷唇口碗和撇口高圈足碗 (圖 8)，以及少量龍泉窯青瓷；稍晚 12 世紀後半至 13 世紀同樣生產於閩江流域的福建仿龍泉窯青瓷 (圖 9)、閩清窯白瓷與青瓷、龍泉窯青瓷，以及為數不少的白瓷壺罐瓶等大形器；最後則是 13 世紀後半至 14 世紀前半的 *Birosuku* 與今歸仁類型瓷器 (圖 9、10)，伴隨龍泉窯青瓷。上述品類組合與臺灣北海岸出土的考古資料可

為呼應 (王淑津、劉益昌，2010：58)，特別是中國陶瓷的大形器迄今未曾在沖繩本島出土，卻出現於緊鄰臺灣東北海岸的先島群島 (森達也，2019)，可能意味著臺灣與琉球群島最南端諸島的往來和交易活動。

誠然，以目前初步的考古調查發現，證據的強度或許尚未能確證福州—臺灣北岸—琉球的陶瓷器交易海上通路，期待未來更廣泛的調查採集和比較研究，當能更確定的勾勒出這條路徑的完整面貌。而本文的分析在這個研究議題上補充了馬祖列島的關鍵性新資料，進一步強化了三地之間橫向聯繫的證據，也說明了強調海陸介面和以海洋文化地景為概念的灘岸考古調查研究，未來應是極具潛力的探索角度。

參考文獻

- 木宮泰彥（1980）。《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於 1965 年）
- 王淑津、劉益昌（2010）。〈大垵坑遺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紀中國陶瓷〉。《福建文博》，2010（1），45-61。
- 王輝（2015）。《青龍鎮：上海最早的貿易港》。上海：上海人民。
- 田中克子（2011）。〈日本博多遺址及周圍地區出土的磁灶窯系陶瓷器〉。在福建省文物局主編，《磁灶窯址：福建晉江磁灶窯址考古調查發掘報告》（頁 409-425）。北京：科學。
- 何孟興（2009）。〈明代福州海防要地「竿塘山」之研究（1368-1456 年）〉，《止善》，7，29-51。
- 何孟興（2015）。《閩海烽煙：明代福建海防之探索》。臺北：蘭臺。
- 李寄嶠、林建偉、葉恩肇、陳正宏、林柏逸（2015）。《馬祖地區〔臺灣地質圖幅及說明書 1/25,000〕》。新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杜臻〔清〕（1983）。《粵閩巡視紀略》。臺北：文海。（原著出版於 1684 年）
-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編）（2007）。《南宋太廟遺址》。北京：文物。
-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編）（2008）。《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
- 林圭偵、鄭玠甫、陳鬱茹（2018）。《拉庫拉庫流域布農族佳心舊社調查研究暨 GIS 故事地圖建置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之研究計畫，未出版）。
- 周婉窈（2012）。《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
- 姜勇、孫靖國（2011）。〈「福建海防圖」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1），67-72。
- 栗建安（2010）。〈從山林到海洋 — 貿易全球化中的福建陶瓷生產與外銷〉。在栗建安主編，《考古學視野中的閩商》（頁 1-67）。北京：中華書局。
- 栗建安（2011）。〈福建的建窯系黑釉茶碗〉。在趙嘉斌、吳春明主編，《福建連江定海灣沉船考古》（頁 425-440）。北京，科學。
- 胡滄澤（1999）。〈唐宋時期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福建師範大學學報》，4，100-104。
- 真人元開〔唐〕（2000）。《唐大和上東征傳·日本考》（李言恭譯〔明〕，汪向榮校註）。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於 779 年）
- 郝玉麟、謝道承（編纂）（1983）。《福建通志》（乾隆二年刊本）。臺北：臺灣商務書館。（原著出版於 1737 年）

- 高良倉吉（2018）。《琉球的時代：偉大歷史的圖像》（蘆荻譯）。臺北：聯經。（原著出版於 2012 年）
- 高榮盛（1985）。〈鄭和航海圖三議〉。在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 580 周年籌備委員會編，《鄭和下西洋論集》（第二集，頁 254-293）。北京：人民交通。
- 曹永和（1998）。〈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在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頁 283-312）。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曹永和（2000）。《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
- 曹剛（修），邱景雍（纂）（1967）。《連江縣志》。臺北：成文。（原著出版於 1927 年）
- 梁克家〔宋〕（1980）。〈三山志〉。在中國地志研編，《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2 冊）。臺北：大化。（原著出版於 1182 年）
- 陳仲玉、游桂香（2010）。〈馬祖東莒島蔡園裡遺址的陶瓷器〉。《福建文博》，2010（2），1-4，91。
- 陳宗仁（2005）。《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
- 陳宗仁（2016）。〈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3），1-42。
- 陳壽彭譯（2004）。〈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在陳支平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北京：九州。（原著出版於 1901 年）
- 董應舉〔明〕（1967）。〈與韓海道議選水將海操〉。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崇相集選錄》（頁 2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2019 年 11 月 1 日檢索自 <http://tcss.ith.sinica.edu.tw/cgi-bin/gsweb/gswweb.cgi/ccd=.FOUIG/search>
-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永豐庫：元代倉儲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
- 趙金勇（2002）。〈東海岸長濱地區史前遺址空間分佈初探〉。《田野考古》，7（1/2），19-44。
- 趙金勇（2016）。〈八裡下厝坑遺址之形成過程探微〉。《田野考古》，18（2），37-70。
- 趙嘉斌、吳春明（主編）（2011）。《福建連江定海灣沉船考古》。北京：科學。
-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96）。〈福州淮安窖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6（1），3-34。
- 臧振華、李匡悌（2013）。《南科的古文明》。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臧振華、李麗芳（主編）（2008）。《海洋臺灣新世界：澎湖馬公商港疑似沈船遺址調查評估報告》。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 鞏珍〔明〕(著)、向達(校注)(2000)。《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於1959年)
- 蔡襄〔宋〕(1991)。《荔枝譜》。上海：上海文藝。(原著出版於1059年)
- 藤原冬嗣、藤原緒嗣〔日・承和〕(840)。《日本後紀》。2020年3月31日檢索自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20%E6%97%A5%E6%9C%AC%E5%BE%8C%E7%B4%80>
- 木下尚子(編)(2009)。《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13-14世紀海上貿易からみた琉球国成立要因の実証的研究：中国福建省を中心に》。熊本，日本：熊本大學文學部木下研究室。
- 黑板勝美(編)(2007)。《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朝野群載》(29卷上)。東京，日本：吉川弘文館。(原著出版於1964年)
- 森達也(2015)。《中國青瓷研究：編年と流通》。東京，日本：汲古書院。
- 森達也(2019)。〈大陸と列島をつなぐ陶磁器流通ルートの様相 — 11-12世紀を中心に —〉。在森達也、藪敏裕、徳留大輔編，《貿易陶磁器と東アジアの物流平泉・博多・中国》(頁79-110)。東京，日本：高志書院。
- 亀井明德(1995)。《福建省古窯跡出土陶磁器の研究》。東京，日本：都北印刷。
- 國立海洋文化財研究所編(2013)。《태안 마도 출수 중국도자기〔泰安馬島出水中國陶磁器〕》。木浦市，南韓：國立海洋文化財研究所。
- Anderson, D. G., Bissett, T. G., Yerka, S. J., Wells, J. J., Kansa, E. C., Kansa S. W., ... White, D. A. (2017). Sea-level rise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destruction: An example from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using DINAA (Digital Index of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y). *PLoS ONE*, 12(11): e0188142. doi:10.1371/journal.pone.0188142
- Liu, Y.-C. & Wang, S.-C. (2017). Encountering the wider world before the transition to history: Chinese ceramics in Proto-historic Taiwan (Tenth through Sixteenth centuries). In M. C. Berrocal & C.-H. Tsang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early modern colonialism in Asia-Pacific: The southwest pacific and oceanian regions* (pp. 270-312 346).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doi:10.5744/florida/9780813054759.003.0011
- Westerdahl, C. (2016). The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oastal cultures. 在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二卷，頁265-287)。北京：科學。